司马懿拒辟与狼顾相考辨

——兼论司马篡魏观念的滥觞与形成

朱子彦

(上海大学 历史学系, 上海 200444)

摘要: 司马懿拒绝曹操征辟可从三方面来考察: 其一, 待价而沽; 其二, 假以时日, 冷静观察; 其三, 不愿追随乃兄。“狼顾相”与自秦以降极为盛行的卜筮、相术、讖谣颇有关联。辨析司马篡魏观念滥觞与形成的历程, 再将“狼顾相”“三马同槽”同讖谣结合起来进行考察, 其疑团也就不难迎刃而解。汉晋之际的诸多童谣、民谣、传言、神仙说与王朝兴废及重要人物的命运皆紧密关联,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朝野与士庶民众的看法。“狼顾相”“三马同槽”即是应验了的童谣, 史家为了使此讖谣更具权威性, 故将其移花接木到曹操身上。曹操与司马懿是魏晋时期的重量级人物, 也是魏晋王朝的肇基之君, 故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讖谣也就不胫而走, 传之后世了。两晋时期所撰的诸家旧晋书的作者有假借史书编纂为新朝寻求政治合法性的可能, 他们灵活地运用“狼顾”说的特异相貌, 以证明晋朝的君权神授, 这也不失为另一种政治神话的论证手段。

关键词: 司马懿; 狼顾相; 三马同槽; 讖谣; 曹操

中图分类号: K2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19) 02-0082-15

司马懿是魏晋易代更祚时期的关键人物, 相关论著堪称宏富, 并无多少剩义可言。然笔者翻阅检索《晋书·宣帝纪》, 始终觉得司马懿出仕及其有所谓“狼顾相”的背后多有疑讖, 其事在若隐若现之间。特别是曹操洞察司马懿有狼顾相, 又梦“三马同食一槽”, 实乃非同寻常之事。若其事属真, 岂不成了“神而先知”^①。若从大处着眼, “狼顾相”是应验如神, 因为司马氏日后灭蜀代魏吞吴, 完成了三分归一统。诸葛亮《隆中对》有诸多已知的基本条件作为依据, 经过分析, 推测未来的天下形势, 但有时仍被赋予先验的色彩, 故田余庆对《隆中对》“加以分析, 使验与未验, 验多验少, 都能得到历史的说明, 从而使人们便于理解”^②。但曹操的狼顾说似不存在任何已知的条件, 曹操时期, 司马懿并无亡魏成晋的任何端倪与征兆, 曹操何以会看出司马懿有狼顾相, 若真的察觉, 又为何不剪除这一心腹之患? 由此看来, 对狼顾说不能以常理度之, 亦不能循已知条件等线索来研究。由于司马懿拒绝曹操的初次征辟与狼顾相有内在的因果联系, 故须将两者连缀起来进行考订辨析。

司马懿一直到建安十三年(208)才进入曹操的幕府, 其时他已是30岁的壮年了。其实司马懿入仕的机会早就出现, 在建安六年(201)抑或元年(196), 他就该步入仕途。《晋书·宣帝纪》有

基金项目: 上海市教委上海大学中国史高原建设项目(2015—2018)。

作者简介: 朱子彦, 上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研究方向: 汉魏史、明史。

① 王充《论衡》卷26《知实篇》,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年, 第158页。

② 田余庆《〈隆中对〉再认识》, 《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

一段不长的记载，书写了司马懿入仕的过程，兹录之如下：

汉建安六年，郡举上计掾。魏武帝为司空，闻而辟之。帝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辞以风痹，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坚卧不动。及魏武为丞相，又辟为文学掾，敕行者曰：“若复盘桓，便收之。”帝惧而就职。

对于这段史料如何看？学者颇有质疑。宋人叶适说：“懿是时齿少名微，岂为异日雄豪之地，而曹操遽惮之至此？史臣及当时佞谀者，意在夸其素美而无辞以述，亦可笑也。”^①认为这条材料乃是出于史臣对西晋开创之主的褒美之词，本非事实。由于《三国志》《晋书》记载对魏晋史事颇多避忌回护，故给史家考订带来很大的不便。叶氏的推论虽然颇符情理，但缺少直接的史料佐证，亦仅仅是猜测而已。笔者试图综合散见于他处的各种史料，进行归纳分析，以作进一步的考察与分析。

唐人修撰《晋书》的诸多事都参阅晋史旧闻，据近代一些学者对于诸家晋书的核查来看，这段记载主要存在于王隐《晋书》和孙盛《晋阳秋》。作为曹魏的四朝元老，两代托孤重臣的司马懿日后“自作家门”，篡夺政权，很难洗刷儒家伦理道德中至关重要的不忠的指责。诚如唐长孺先生所指出：西晋大力倡导以孝治天下，极力回避对于忠的问题的讨论。^②从《晋书》作者的意图来看，晋代史臣的这段记载在很大程度上有为尊者讳的可能，力图塑造一个司马懿心存汉室，本“不欲屈节曹氏”的假象，从而为司马氏最终代魏辩护。那么，司马懿为何要拒绝曹操的征辟呢？我以为可从三个方面来考察：

其一，待价而沽。汉末的真名士淡泊名利与假名士沽名钓誉，拒绝朝廷征辟已成为一种风尚。检阅《后汉书·儒林列传》《逸民列传》《黄琼列传》和《三国志·管宁传》《胡昭传》等，此类记载比比皆是。此风相沿成习，司马懿亦不能免俗。司马氏为河内郡温县大族，门第甚高。司马懿父京兆尹司马防有八子，“俱知名，故时号为‘八达’焉”^③。东汉重清议，乡里评论是清议的基础，更是入仕的主要依据。河内最有影响力的评论家是杨俊，司马朗、司马芝、司马懿最初的出名皆因其而品评。史载：“司马朗早有声名，其族兄芝，众未之知，惟俊言曰：芝虽夙望不及朗，实理但有优耳。”司马懿十六七岁时碰到杨俊，杨俊大吃一惊，说他是“非常之人也”^④。尚书崔琰是东汉经学家郑玄弟子，出身望族，名重当世，为曹操所倚重，长期典选举，素有识人之誉。他与司马朗交好，亦十分钦佩朗之才学，但对司马懿更为看重，认为懿之才智远在乃兄之上。《三国志·崔琰传》载：“始，琰与司马朗善，晋宣王方壮，琰谓朗曰：‘子之弟，聪哲明允，刚断英跬，殆非子之所及也。’朗以为不然。而琰每乘此论。”^⑤司马懿得到杨俊、崔琰等人的褒扬，在士林中顿时声名鹊起，亦颇为自负。

司马懿既然得到名士的大力推崇，必然心高气傲，自负其才，希图在仕途上有较高的起点。然而“汉建安六年，郡举上计掾”。所谓上计，即由地方县令长于年终将该县户口、垦田、钱谷、刑狱状况等，编制为计簿，呈送郡国。根据属县的计簿，郡守国相再编制郡的计簿，上报朝廷。朝廷据此评定地方行政长官的政绩。这种考评地方官的方式战国已有之。然而“上计掾”并非官，而只是吏。钱穆云：“太学毕业考试甲等的就得为郎……至考乙等的，回到本乡地方政府充当吏职。”^⑥郎称之为郎官，而吏只是地方长官的掾属，二者截然不同。汉代“计吏拜官”，从吏到官，还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更不巧的是司马懿担任的竟然是“上计掾”。据《后汉书·杨秉列传》载：“时郡国计吏，多留拜为郎，秉上言三署见郎七百余，帑藏空虚，浮食者众，而不良守相，欲因国为池，浇灌衅秽。宜绝横拜，以塞觊觎之端。自此终桓帝世，计吏无复留拜者。”上计掾不得担任郎官，岂非堵塞了司

①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29《晋书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07页。

②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的君父先后论》，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8-239页。

③ 《晋书》卷37《安平献王孚传》。

④ 《三国志》卷23《杨俊传》。

⑤ 《三国志》卷12《崔琰传》。

⑥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3页。

马懿仕途的上升通道。

名士觊觎高位，不愿从仕途的基层起步之例颇多，如诸葛亮未出草庐时就自视极高。《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曰：“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问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后公威思乡里，欲北归，亮谓之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襄阳名士，号为“凤雏”的庞统亦自命不凡，刘备初见庞统时，任其为耒阳县令，县令主事一方，官俸六百石，初入仕的起点并不算低，然而庞统竟放浪形骸，不理县事。《三国志·庞统传》载：“先主领荆州，统以从事守耒阳令，在县不治，免官。吴将鲁肃遗先主书曰：‘庞士元非百里才也，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骥足耳。’”直至鲁肃褒赞庞统非百里之才，刘备“大器之，以为治中从事。亲待亚于诸葛亮，遂与亮并为军师中郎将”，庞统才心满意足。

曹操霸府中诸多名士的起点似也超过司马懿，如荀彧“永汉元年，举孝廉，拜守宫令”^①。“何进秉政，征海内名士（荀）攸等二十余人，攸到，拜黄门侍郎。”^②“钟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人也……举孝廉，除尚书郎，阳陵令。”^③郭嘉初见曹操，操与之“论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表为司空军祭酒”^④。“王郎字景兴，东海郡郟人也。以通经，拜郎中，除菑丘长。”^⑤甚至连寒门出身的贾诩都“察孝廉为郎”^⑥。比照之下，出身于“累世二千石”，且在士林中颇有声望的司马懿对于仅当一个不入流的上计掾小吏当然心中愤愤不平。恰巧，此时曹操征辟令至，司马懿不仅拒辟，干脆连上计掾也一并辞去。

其二，假以时日，冷静观察。从司马氏家族与曹操的关系来看，司马懿亦不应该成为曹操的对立面。懿父司马防与曹操熟识，任尚书右丞时曾推荐曹操担任洛阳北部尉。^⑦后来司马防一直效力于曹操控制下的汉廷，司马朗建安初便被辟为曹操司空府掾属。可知司马氏家族与曹操素有来往，关系密切，司马懿没有理由疏远曹操。清人张燾认为“汉建安六年，郡举上计掾。魏武帝为司空，闻而辟之”中的“六年”，很可能是“元年”之讹。^⑧若张燾所考不误，则建安元年的天下形势较为复杂：此时，各路诸侯蜂起，孰强孰弱，瞬息万变，诚如周瑜与鲁肃书中援引“马援答光武云，‘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⑨。司马懿身处汉末离乱之世，胸怀王霸之才，一旦出仕，如何“择君”？必然慎重考量。所谓“不欲屈节曹氏”并非是司马懿心存汉室，抑或嫌曹氏出身卑微，司马懿熟读经史，深知英雄不问出身的道理，其政治见识也决不在“汝颖奇士”之下。^⑩虽然司马氏家族与曹氏素有交往，但曹操的客观条件亦并非是司马懿对人主的不二之选。建安元年，曹操刚从吕布手中夺回兖州，经过连年战争，作为曹操的根据地——兖州已残破不堪。虽然曹操将汉献帝迎至许昌，但汉家新朝廷初建，诸事草创，曹操号令基本不出河南，根本不可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势力与其他诸侯相比，并无任何优势可言。《晋书·宣帝纪》云：司马懿性格“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内忌、猜忌者乃雄猜多疑也，司马懿多疑，对择何人为君起初也必然是犹豫彷徨，所以他要冷静观察后

① 《三国志》卷10《荀彧传》。

② 《三国志》卷10《荀攸传》。

③ 《三国志》卷13《钟繇传》。

④ 《三国志》卷14《郭嘉传》。

⑤ 《三国志》卷13《王朗传》。

⑥ 《三国志》卷10《贾诩传》。

⑦ 《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曹瞞传》曰：“为尚书右丞司马建公所举。及公为王，召建公到邺，与欢饮，谓建公曰：‘孤今日可复作尉否？’建公曰：‘昔举大王时，适可作尉耳。’王大笑。建公名防，司马宣王之父。”

⑧ 张燾《读书举正》卷3，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46页。

⑨ 《三国志》卷54《鲁肃传》。

⑩ 汝颖奇士如嫌曹操是“赘阉遗丑”的身份，荀彧、荀攸、戏志才、郭嘉、钟繇、陈群等一大批汝颖士人就不会相继投奔曹操，成为曹操霸府的主要谋臣。

再作决定。

其三，不愿追随乃兄。司马懿兄司马朗何时出仕，任曹操司空掾属，史家颇多质疑。《三国志·司马朗》载：“（司马朗）年二十二，太祖辟为司空掾属”，“建安二十二年，与夏侯惇、臧霸等征吴……遇疾卒，时年四十七”。潘眉在《三国志考证》中的意见是：“太祖以建安元年拜司空，辟朗为司空掾，朗时年二十二。至建安二十二年卒，止有四十三岁，传误。”^① 笔者无意考订司马郎受征辟的具体时间，但需要考量的是，无论司马懿在其兄之前、之后，抑或是同时受征辟，司马懿都有顾虑。此种状况，在诸葛亮身上也出现过，诸葛亮高卧隆中时，乃兄诸葛瑾已在孙权幕府中任长史，颇受重用。诸葛亮若要“闻达于诸侯”^②，最方便的就是追随其兄，投奔东吴。然而诸葛亮就是迟迟不肯出山。后来张昭将诸葛亮推荐予吴主时，亮断然拒绝道：“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③ 诸葛瑾亦复如此，刘备发动夷陵之战时，有人怀疑诸葛瑾将弃吴投蜀，孙权断然不信，并曰：“玄德昔遣孔明至吴，孤尝语子瑜曰：‘卿与孔明同产，且弟随兄，于义为顺，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从卿者，孤当以书解玄德，意自随人耳。’子瑜答孤言：‘弟亮已失身于人。委质定分，义无二心。弟之不留，犹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贯神明，今岂当有此乎！”^④ 诸葛亮还有族弟诸葛诞在曹魏为宦。《吴书》曰：“初，瑾为大将军，而弟亮为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马，督领将帅，族弟诞又显名于魏。一门三方为冠盖，天下荣之。”^⑤ 诸葛氏三兄弟分别仕于魏蜀吴三国，不失为于乱世中进退自如，保全家族的最佳良策。而此时司马懿父防、兄朗、堂兄芝皆在曹操霸府中供职，若司马懿追随父兄，应操之征辟，不仅在仕途上难于超越父兄，且把全族之生死存亡皆系于曹操一人，万一曹操失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司马家族亦岂能幸免！司马懿精通韬略，具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在涉及自己未来仕途及家族兴衰存亡的问题上怎么能不深思熟虑，谋定而后动！

司马懿拒绝征辟这段史料还有一个难解之处，即其拒绝征辟之后，“辞以风痹，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坚卧不动。”这里的问题是司马懿是否装病？曹操是否派人去刺杀司马懿？有学者认为《晋书·宣帝纪》中关于司马懿装病之事乃是虚构，其目的是为司马氏后来篡魏成晋讳饰。^⑥ 我以为所谓司马懿“不欲屈节曹氏”，乃出自晋代史臣的手笔，其后流布颇广，影响甚大，成为司马懿代表汝颖士族集团颠覆曹魏政权的有力依据，房玄龄等人修《晋书》不过是照录晋史旧闻而已。陈寅恪曾指出：“儒家豪族是与寒族出身的曹氏对立的。官渡一战，曹氏胜，袁氏败。儒家豪族阶级不得不暂时隐忍屈辱。但乘机恢复的想法，未尝一刻抛弃。”^⑦ 对于部分“儒家豪族”来说，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如杨彪、孔融、金祚、耿纪等人，确如陈寅恪所言，他们“乘机恢复的想法，未尝一刻抛弃”，但司马懿绝非如此，其拒聘曹氏理由已见上述。

我以为，司马懿“不欲屈节曹氏”是假，但“辞以风痹”是真。^⑧ 这不仅有序后高平陵政变之前其诈病赚曹爽可以佐证，且《晋书·宣穆张皇后传》也有明确记载：“宣帝初辞魏武之命，托以风痹，尝暴书，遇暴雨，不觉自起收之。家惟一婢见之，后乃恐事泄致祸，遂手杀之以灭口，而亲自执纆。帝由是重之。”所谓“风痹”，又称“行痹”或“周痹”，中医学是指因风寒湿侵袭而引起的肢节疼痛或麻木的病症。临床表现为肢体酸痛，痛而游走无定处。病因风寒湿三邪中以风邪偏胜，而风邪易于游走所致。故《素问·痹论》说：“其风气胜者，为行痹。”然症状轻重如何？诸多史料并

① 卢弼《三国志集解》卷15《司马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20页。

② 诸葛亮《出师表》云：“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参见《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

③ 《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注引《袁子》。

④ 《三国志》卷52《诸葛瑾传》注引《江表传》。

⑤ 《三国志》卷52《诸葛瑾传》注引《吴书》。

⑥ 张大可：《三国人物新传》第6编“司马懿”，北京：华文出版社，2003年。

⑦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讲录》，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页。

⑧ 汉魏之际士人装病拒辟并不局限于司马懿，程昱亦复如是。《三国志》卷14《程昱传》载：“初平中，兖州刺史刘岱辟昱，昱不应……岱表昱为骑都尉，昱辞以疾。”

无十分清晰的诠释。《灵枢经·寿夭刚柔》：“病在阳者命曰风病，在阴者命曰痹病，阴阳俱病，命曰风痹病。”《宋书·隐逸传·周续之》云：“续之素患风痹，不复堪讲，乃移病钟山。”苏辙《记病》诗：“侵寻作风痹，两足几蹒跚。”《景岳全书·杂症谟》：“风痹一症，即今人所谓痛风也。”司马懿“托以风痹”，不仅瞒住曹操，连府中仆婢等也一概不知。某日，天降暴雨，司马懿忍不住从床上起身将所晒的书收起，不巧的是，此举给一婢女看见。司马懿“托以风痹”，风痹有轻有重，未必就不能行走，但司马懿自称此病严重到“不能起居”，如能下床行走，就等于告知世人，我是装病。为怕泄漏，懿妻张氏杀婢灭口。此后，张氏屏退左右，亲自下厨烹饪。

司马懿虽然在汉末士林中有不错的品评，但其名望与曹操霸府中一流谋臣荀彧、荀攸、程昱、贾诩、郭嘉等人相比尚有一定的差距。操之霸府中，不乏人才，自然毋需如刘备那样“三顾”懿之府第。但曹操何以在征辟失败后，还要“使人夜往密刺之”。对这句话的解读，有学者以为是曹操派刺客行刺司马懿。^①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此时的司马懿齿少名微，并未崭露头角，哪里就值得曹操大费周折地派人前往行刺，这实在是个匪夷所思的问题。我以为关键的问题是对“刺”字作何解读？查阅《辞海》，刺字有多种释意，除刺杀、针刺外，“刺”又作刺事（打探事情）、刺取（刺探）、刺候（侦察）之解。如《汉书·陈万年传》：“成素善云，云从刺候，教令上书自讼。”《新唐书·封伦传》：“伦资险佞内挟，数刺人主意，阴导而阳合之。”即是二例。

关于司马懿拒辟之事，在臧容绪《晋书》中有另一种叙述：“魏武辟高祖。高祖以汉祚将终。不欲屈节于曹氏。辞以风痹不能起居。魏武遣亲信令史，微服于高祖门下树荫下息。时七月七日。高祖方曝书。令史窃知。还具以告。”^②将臧容绪《晋书》及《晋书·宣穆张皇后传》相互参证起来看，可窥知司马懿曝书的细节。更为重要的是臧容绪《晋书》较为合理地诠释了《晋书·宣帝纪》中“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坚卧不动”语。所谓的“密刺之”绝不能作“刺杀”“针刺”解，而应作刺探、刺候、刺事释。曹操见司马懿“辞以风痹不能起居”，将信将疑，故派遣亲信令史，微服于司马懿府第门口树荫之下，刺探其事真伪。七月七日，司马懿曝书之事被令史获知，即向曹操汇报。我推测，令史只刺探到司马懿“曝书”，曝书当然由司马懿府第仆婢等人来做，而不用懿亲为之。至于曝书时，遇到暴雨，司马懿“不觉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见之，后乃恐事泄致祸，遂手杀之以灭口”的情形，除司马懿夫妇之外，他人一概不知，令史不在现场，婢女被杀后，此事消弭于无形，令史连风闻也不可能。令史之刺探基本上是一无所获，唯有如此，司马懿才能躲过一劫。若不参证比对臧容绪《晋书》及《晋书·宣穆张皇后传》，单从字面上来解读“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坚卧不动”，必然得出不合常理的解释：首先，司马懿家世二千石，并非寻常素族寒士可比，其府第虽然不至于戒备森严，但家中仆婢甚多，刺客怎么能畅通无阻地深夜闯入司马懿卧室；其次，当刺客将刀剑架在司马懿头颈上，司马懿居然“坚卧不动”，得无过于夸大其辞！^③其实，《宣帝纪》中的“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坚卧不动”亦并非纯属乌有，虚构其事，^④问题是读者如何理解。我以为不能光看“坚

① 周一良云：“懿‘辞以风痹，不能起居’，以致使人密往行刺。”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曹氏司马氏斗争”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6页；方北辰著作中有“他取出早已准备好的银针，在司马懿腿脚上乱刺”之说，参见方北辰：《谁结束了三国？司马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页。

② 汤球辑、杨朝明校补：《九家旧晋书辑本》，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8页。

③ 案：建安二年（197），曹操欲伐张绣，临行前朝见汉献帝，“帝不任其愤，因曰‘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面对献帝突如其来之愤怒，曹操大惊“失色，俛仰求出”。操久经沙场，何以会“失色”。因为，“（汉）旧仪，三公领兵朝见，（天子）令虎贲执刀挟之”。参见《后汉书》卷10下《献帝伏皇后纪》；《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世语》亦有类似记载：“三公领兵入见，皆交戟叉颈而前，初，公将讨张绣，入觐天子，时始复此制。”当时，汉献帝怒气冲冲，若虎贲用戟一刺，曹操即死于非命。所以“操出，顾左右，汗流浹背，自后不敢复朝请”。参见《后汉书》卷10下《献帝伏皇后纪》。以此事推论，司马懿若面对刀剑，难道能“坚卧不动”？

④ 柳春藩认为曹操派人行刺及司马懿“坚卧不动”之事纯属史家虚构。参见柳春藩《正说司马懿》，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第20-21页。

卧不动”，还应注意前文的“不能起居”。所谓“不能起居”，即他所患的风痹之症已严重到卧床不起，如果司马懿能够起居自如，例如曝书时“遇暴雨，不觉自起收之”之事被曹操知晓，其弥天大谎将不攻自破。所以司马懿装病，只能“坚卧不动”，尽管曹操派遣的令史并不在身边，他也不敢有丝毫大意，因为令史就在府门之外，刺探消息，若婢仆走漏风声，就会给自己带来不测之祸。

实事求是地说，《晋书·宣帝纪》对于这段史事的叙述基本上还是正确的，在司马懿的政治生涯中，用得最多的就是韬晦之计，“深藏不露、坚忍不拔”是司马懿一生的写照。正如陈寅恪所指出：“司马懿的坚忍阴毒，远非汉末同时儒家迂缓无能之士所能比。”^①其“坚卧不动”也是坚忍的表现。只不过是《宣帝纪》中的这段文字过于简略，表述亦欠精确，容易造成误解而已。之所以有这方面的缺陷，可能还是为尊者讳饰，不欲在细节上过多暴露司马懿的阴谋权术。

对《宣帝纪》中：“及魏武为丞相，又辟为文学掾，敕行者曰：‘若复盘桓，便收之。’帝惧而上任。”作何解？如果单从“惧而上任”来诠释，我以为还是过于粗疏简陋。“魏武为丞相”是建安十三年（208）初，其时曹操已攻灭袁氏，平定乌桓，统一北方，汉末由乱入治的局面已初步显现，司马懿若此时再不入曹操霸府，就将失去步入仕途、一展宏图的机会。另外，司马懿此次出山，还找到了两个自下台阶的好机会，一是曹洪征辟：“晋宣帝好学，曹洪自以龠疏，欲屈自辅帝，帝耻往访，乃托病拄杖。洪恨之，以语太祖，太祖辟帝，乃投杖而应命也。”^②二是由海内第一名士，被曹操誉为“吾之子房”，最为倚重的心腹谋臣荀彧的推荐：“彧又进操计谋之士从子攸，及钟繇、郭嘉、陈群、杜袭、司马懿、戏志才等。”^③“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邦邑则荀攸、钟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④正是在荀彧的大力推荐下，司马懿才得以为丞相文学掾。司马懿日后对荀彧的事功作出了高度评价：“书传远事，吾自耳目所从闻见，逮百数十年间，贤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⑤司马懿成为曹魏重臣之后，十分感激荀彧昔时的举荐之恩，遂大力拔擢荀氏子弟。^⑥可见，在惺惺作态、待价而沽之后，建安十三年，司马懿已亟欲出仕，其热衷于功名之心跃然于纸上。

二

司马代魏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事实上直到高平陵政变后，司马氏完全掌控朝政大权，天下士人才意识到司马氏将倾覆魏朝。司马懿初入仕途，在政治上并不引人注目，然而曹操竟看出司马懿有“狼顾相”，这不能不说是件匪夷所思之事。^⑦《晋书·宣帝纪》载：

帝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魏武察帝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又尝梦三马同食一槽，甚恶焉。因谓太子丕曰：“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太子素与帝善，每相全佑，故免。帝于是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由是魏武意遂安。

从以上记载看，曹操对司马懿十分忌惮，若非曹丕庇佑及司马懿废寝忘食的“勤以吏职”，司马懿则难以幸存。懿有“狼顾相”虽然日后被亡魏成晋的史实所证明，但曹操何以能预判，且预判得如此准确！不由人不感到惊诧莫名。然研治魏晋史的学者大都对这段史料匆匆略过，未作精深探究。

①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页。

② 虞世南《北堂书钞》卷133引《魏略》，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第536页。

③ 《后汉书》卷70《荀彧列传》。

④ 《三国志》卷10《荀彧传》注引《彧别传》。

⑤ 《三国志》卷10《荀彧传》注引《魏氏春秋》。

⑥ 《三国志》卷10《荀彧传》注引《晋阳秋》载：“司马宣王见（荀）顗，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近见袁傪，亦曜卿之子也。’擢拜散骑侍郎。”

⑦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0载：“魏之亡，自曹丕遗诏命司马懿辅政始。懿之初起为文学掾，岂夙有夺魏之心哉？”参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0页。

为了摒除先验论的色彩,我试将相关资料综合起来作一考辨,若能自成一说,引起同好兴趣,与我商榷,则为幸事也。所谓的“狼顾相”当然不是指人在肩头不动的情况下头颈像狼哪样来个近似180度的旋转。那么何来狼顾之谓呢?《人伦大统赋》曰:“狼顾者,谓回头顾而身不转,性狠,常怀杀人害物之心。”^①《相理衡真》云:“狼目,低头反顾,蹙眉而视,黑多白少,心毒多妒,贪婪好淫。”^②然而,“狼顾”之词有多义。古人有时亦用“狼顾”来形容黎庶百姓遭遇自然灾害之苦。如柳宗元《行路难》诗之二:“栢梁天灾武库火,匠石狼顾相愁冤。”苏舜钦《上范希文书》:“今虽少稔,恐来年宿麦不登,民必狼顾矣。”这里的“狼顾”,是用来形容民间疾苦的,与狼的特征及奸恶之人毫无关系。当然,在更多的场合下,“狼顾”是骂骂斥责乱世枭雄的奸诈与野心。如《昭明文选》卷四四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自董卓作乱,以迄于今……锋捍特起,鸱视狼顾,争为枭雄者,不可胜数。”《晋书·刘聪载记》:“石勒鸱视赵魏,曹窳狼顾东齐。”《金史·礼志一》:“海陵狼顾,志欲并吞江南。”

从上引史料来看,狼顾基本上与人之容貌无关。司马懿容貌未见史载。《晋书·宣帝纪》解释其“狼顾相”时说:“迹其猜忍,盖有符于狼顾也。”与相貌亦无关联。那么,曹操为何要测试司马懿是否有狼顾相呢?我疑此事同司马懿最初拒绝曹操征辟有关,虽经很多学者考证论定司马懿“不欲屈节曹氏”是假,是《晋书》为其开脱,洗刷其不忠之迹,但雄猜多疑“酷虐变诈”^③的曹操怎知司马懿“不欲屈节曹氏”之真伪与否?

曹操出身于寒门素族,为阉宦之后,颇疑衣冠望族出身的名士不肯与之合作。其起兵之初,倚仗的是谯沛集团的子弟兵。后经其礼贤下士,颁布《求才令》后,一批汝颖士人逐渐归附曹操,形成与谯沛集团并立的汝颖士人集团,共同辅助曹操。然而汝颖集团中仍有相当一部分士人“心存汉室”,亦可谓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在汝颖集团中,荀彧是拥汉派的典型代表。荀彧、荀攸、荀悦等人是汉末第一流高门。荀彧又与曹氏联姻,长子荀恽娶曹操之女,荀彧女又嫁给了陈群。这样一个家族,颇能代表汝颖士人的核心利益,故荀氏家族的政治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汝颖集团的整体政治倾向。荀彧忠于汉室,其辅佐曹操,初衷并非谋取功名利禄,而是要借曹氏力量挽救汉朝。他认为,在汉末乱世之际,只有雄才大略的曹操才有能力匡复汉朝。正如裴松之所言:“彧岂不知魏武之志气,非衰汉之贞臣哉?良以于时王道既微,横流已极,雄豪虎视,人怀异心,不有拨乱之志,仗顺之略,则汉室之亡忽诸,黔首之类殄矣。夫欲翼讚时英,一匡屯运,非斯人(指曹操)之与而谁与哉”?^④而当曹操代汉态势明朗化时,荀彧就陷入了两难处境:一边是曹氏代汉之志已十分明显,其势诚不可挡;另一边是,自己保汉匡君的夙愿未能如愿。建安十七年(212),谏议大夫董昭倡议为曹操晋爵并赐九锡,^⑤但董昭的这个提议却遭致荀彧的反对。彧曰:“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振汉朝,虽勋庸崇著,犹秉忠贞之节,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⑥荀彧反对曹操受九锡,曹操不能容忍,于是顿起杀心。操于“南征孙权”的行军途中,“表请彧劳军于谯……书奏,帝从之,遂以彧为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至濡须,彧病留寿春,操馈之食,发视,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⑦。

荀彧反对曹操代汉,曹操将其诛杀是震动当时政坛的一件大事,此事对曹操刺激颇深,给他的心理留下了极大的阴影,即他与汝颖士人能否继续合作下去。

① 张行简《人伦大统赋》,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8页。

② 陈钊《相理衡真》,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77年,第175页。

③ 《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曹瞒传》。

④ 《三国志》卷10《荀彧传》裴注。

⑤ 董昭对曹操言:“自古以来,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处人臣之势者也……明公忠节颖露,天威在颜,耿弇床下之言,朱英无妄之论,不得过耳。昭受恩非凡,不敢不陈。”参见《三国志》卷14《董昭传》。

⑥ 《后汉书》卷70《荀彧列传》。

⑦ 《后汉书》卷70《荀彧列传》。

司马懿自高祖司马钧以来，累世为二千石高官，懿父司马防以守礼法著名于世。^① 司马懿本人“少有奇节，聪朗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②。这样一个门第、才华、儒学都不在陈群、钟繇等人之下的大族，最后为荀彧所引进。在荀彧、荀攸死后，司马懿、陈群等就成了汝颖集团的中心人物。^③ 司马懿曾奉曹操之命与太子交游，“魏国既建，迁太子中庶子。每与大谋，辄有奇策，与陈群、吴质、朱铄号曰四友”^④，为曹丕所倚重。事实上，司马懿越是向汝颖士人靠拢，越是成为汝颖集团的中心人物、核心成员，越是得到太子曹丕的信任，曹操就越不放心，十分害怕他成为第二个荀彧，心存汉室，图谋匡复。

司马懿虽然于建安十三年（208）应征于曹操幕府，但其初次拒绝征辟之事曹操绝不会忘却，自然留下不良的印象。司马懿进入曹操幕府后，曹操时刻注意其行动举止，故才有“闻有狼顾相”一说，我揣度曹操此时疑司马懿有狼顾相，倒并非是后人所指的司马懿有篡位谋反之相。荀彧对司马懿有知遇之恩，荀彧死后，汝颖集团重新洗牌组合，司马懿作为汝颖集团新的核心成员，操疑懿仍有可能心存汉室，而不专心效忠曹氏。从《汉书·食货志》与《史记·苏秦列传》^⑤ 中看，“狼顾”除有狼子野心之解外，还有狼生性多疑，行走时不断回顾，防人袭击之释，狼瞻前顾后的特征与狼顾相颇有契合之处。荀彧死后，曹操扫除了其代汉的一大障碍，建安十八年（213），曹操晋爵魏公，其代汉之心愈益迫切，故对士人的动向更为关注。清河名士中尉崔琰在给杨训的书信中写道：“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⑥ 曹操竟以“腹诽心谤”^⑦ 罪将其下狱赐死，实质上操是认为崔琰已窥破其代汉之心，不忠于己。^⑧ 崔琰与司马懿兄司马朗友善，司马懿同崔琰关系亦非同一般，^⑨ 故曹操对司马懿是否“心存汉室”更增添了一层疑虑。^⑩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探讨，即曹操为何会相信“狼顾相”，而“欲验之”，我以为这与自秦以降极为盛行的卜筮、相术颇有关联。东汉末年卜筮、讖谣、相术极为流行，成为浸淫时代的风尚。如朱建平即是汉魏之际著名的相术家。《三国志·方技传》记载了朱建平相术的神效，兹不妨节录如下：

朱建平，沛国人也。善相术，于闾巷之间，效验非一。太祖为魏公，闻之，召为郎。文帝为五官将，坐上会客三十余人，文帝问己年寿，又令遍相众宾。建平曰：“将军当寿八十，至四十时当有小厄，愿谨护之。”谓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为州牧，而当有厄，厄若得过，可年至七十，致位公辅。”谓应璩曰：“君六十二位为常伯，而当有厄，先此一年，当独见一白狗，而旁人不见也。”谓曹彪曰：“君据藩国，至五十七当厄于兵。宜善防之。”……文帝黄初七年，年四

① 《三国志》卷15《司马朗传》注引司马彪《序传》曰：“父防，字建公，性质直公方，虽间居宴处，威仪不忒。雅好《汉书》名臣列传，所讽诵者数十万言。少仕州郡，历官洛阳令、京兆尹，以年老转拜骑都尉。养志闾巷，阖门自守。诸子虽冠成人，不命曰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问不敢言，父子之间肃如也。”

② 《晋书》卷1《宣帝纪》。

③ 万绳楠《曹魏政治派别及其升降》，《历史教学》1964年第1期；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78-92页。

④ 《晋书》卷1《宣帝纪》。

⑤ 《汉书》卷24上《食货志》曰：“失时不雨，民且狼顾。”颜师古注引李奇曰：“狼性怯，走喜还顾，言民见天不雨，今亦恐也。”《史记》卷69《苏秦列传》记载苏秦游说齐王时说：“秦虽欲深入，则狼顾，恐韩、魏之议其后也。是故恫疑，虚獯，骄矜而不敢进，则秦之不能害齐亦明矣。”此中“狼顾”之意是指秦欲攻齐，但顾虑韩、魏会乘虚而入，故不敢轻举妄动。

⑥ 《三国志》卷12《崔琰传》。

⑦ 《三国志》卷12《崔琰传》注引《魏略》。

⑧ 卢弼对崔琰死因有精辟的分析：“或曰：‘魏武之除孔北海，势固宜尔，若崔季珪本为操之心膂，徒以口语猜嫌杀之，残恶极矣。’弼按：魏武有篡夺之心，而又欲避篡夺之名，琰与训书不啻窥见其隐衷，发泄其诡谋，故深恶之而置诸死地也。”参见卢弼：《三国志集解》卷12《崔琰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51页。

⑨ 案：崔琰对司马懿的高度品评见前述。

⑩ 案《晋书》卷1《宣帝纪》载：“权遣使乞降，上表称臣，陈说天命。魏武帝曰：‘此儿欲踞吾著炉炭上邪！’答曰：‘汉运垂终，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权之称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谦让者，畏天知命也。”我以为要等到司马懿在政治上正式表态，支持曹操代汉称帝，操才会完全消除疑虑。

十，病困。谓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谓昼夜也，吾其决矣。”顷之，果崩。夏侯威为兖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分必死，豫作遗令及送丧之备，咸使素办。至下旬转差，垂以平复。三十日日昃，请纪纲大吏设酒，曰：“吾所苦渐平，明日鸡鸣，年便五十，建平之戒，真必过矣。”威罢客之后，合瞑疾动，夜关遂卒。璩六十一为待中，直省内，欻见白狗，问之众人，悉无见者。于是数聚会，并急游观田里，饮宴自娱，过期一年，六十三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与王凌通谋，赐死。凡说此辈，无不如其言，不能具详，故粗记数事。

比朱建平更知名、更神奇的方技家是管辂，其精通《周易》，明天文地理，占卜看相，风水堪舆，无不精微，相传每言辄中，出神入化，有神卜之称。陈寿将朱建平、管辂、周宣、华佗等人事迹合为《方技传》，并评曰：“华佗之医诊，杜夔之声乐，朱建平之相术，周宣之相梦，管辂之术筮，诚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绝技矣。昔史迁著扁鹊、仓公、日者之传，所以广异闻而表奇事也。故存录云尔。”^①曹操与管辂、朱建平等系同时代人，朱建平还是曹操同乡，操为魏公时，将朱建平“召为郎”，耳濡目染其相术，必然叹服其神奇，故不排斥其闲暇时向朱建平请教相术的可能，当操闻司马懿有“狼顾相”时，即欲验之，以小试其所学之相术耳。

对于曹操“梦三马同食一槽”，以及他对曹丕说：“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作何解？我感觉这是一个比“狼顾相”更晦幽不明的难题。所谓的占梦、解梦当然由来已久，《周公解梦》即是一本民间流传甚广的秘籍。《三国志·方技传》中的周宣是汉魏之际的相梦家，史称“宣之叙梦……十中八九，世以比建平之相矣”^②。周宣为魏文帝曹丕相梦十分准确，^③而操、丕为父子，据此推测，周宣对曹操的占梦亦不无影响。

有关“三马同食一槽”依据何在？迄今并无直接史料可以推测，甚至连现存的诸家旧晋书一鳞半爪的佚文中亦难以寻觅其史源。所谓司马懿的“雄豪志”，也就是其代魏之心何时产生？何时被时人察觉？历来众说纷纭，颇有争议。令人费解的是《晋书·景怀夏侯皇后传》中，居然有司马氏父子在青龙二年（234）之前谋划代魏的记载。《传》云：“后雅有识度，（景）帝每有所为，必豫筹划。魏明帝世，宣帝居上将之重，诸子并有雄才大略。后知帝非魏之纯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青龙二年，遂以鸩崩，时年二十四，葬峻平陵。”此段史料可能涉及夏侯徽因发现司马父子谋反的计划而遭鸩毒，若其事属实，那就说明司马懿在策动高平陵政变的15年前就在预谋代魏了。然而，其事颇多疑点：其一，太和、青龙年间，曹睿在位，魏明帝沉毅果断，大权独揽，从容驾驭群臣，政由己出，曹魏名臣刘晔评曰：“秦始皇、汉武帝之侔，才具微不及耳。”^④可见，其不失为一代明君。司马懿此时刚获兵柄，在魏朝本未固，基未稳，若谋逆，岂非是自取倾家覆族之祸。其二，青龙二年（234），诸葛亮率10万大军攻魏，司马懿在五丈原与诸葛亮苦苦相持，前线军情十万火急，胜负难以逆料，司马懿自顾不暇，岂有心思筹划代魏之阴谋。因此事疑点重重，故《资治通鉴》未载之于册。司马光在《考异》中云：“按是时司马懿方信任于明帝，未有不臣之迹，况其诸子乎？徒以魏甥之故，猥鸩其妻都非事实，盖甚之之辞。不然，（司马）师自以他故鸩之也，今不取。”^⑤可见，司马光史识之高。

除司马师因谋逆泄漏鸩杀其妻纯系捏造外，《晋书》中还有诸多记载将司马氏的“不臣之迹”昭示于魏明帝青龙年间。如郭颁《世语》曰：“（明）帝忧社稷，问（陈）矫曰：‘司马公忠正，可谓社稷之臣乎？’矫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⑥《晋书·五行志》中更是多次以天人感应之

① 《三国志》卷29《方技传》。

② 《三国志》卷29《方技传》。

③ 《三国志》卷29《方技传》。

④ 《三国志》卷3《明帝纪》注引《世语》。

⑤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72“青龙二年考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83页。

⑥ 《三国志》卷22《陈矫传》注引《世语》，第644页。

象喻指司马代魏之兆：

明帝太和三年，曹休部曲丘奚农女死复生。时又有开周世冢，得殉葬女子，数日而有气，数月而能言，郭太后爱养之。又，太原人发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妇人，问其本事，不知也，视其墓木，可三十岁。案京房《易传》曰“至阴为阳，下人为上。”宣帝起之象也。汉平帝、献帝并有此异，占以为王莽、曹操之征。^①

魏明帝青龙三年正月乙亥，陨石于寿光。案《左氏传》“陨石，星也”，刘歆说曰“庶众惟星陨于宋者，象宋襄公将得诸侯而不终也。”秦始皇时有陨石，班固以为“石，阴类也。又白祥，臣将危君。”是后宣帝得政云。^②

对上述史料如何审读？是需要仔细掂量，甚至是要考订的。如郭颁《魏晋世语》收集的稗官野史，多有妄语，其中的讹谬乖违之处不可尽信。裴松之认为“溥著《江表传》，亦粗有条贯，惟颁撰《魏晋世语》，蹇乏全无宫商，最为卑劣，以时有异事，故颇行于世。干宝、孙盛等多采其言以为《晋书》，其中虚错如此者，往往而有之。”^③至于《五行志》更是荒诞不经。吕宗力在《汉代的谣言》一书中指出：“民间流传的传奇‘俗说’，有些已著录文本。这些言论通常被视为虚妄、谬误、无稽、迷信，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捏造的消息，怪诞不经的邪说，易为有心人利用来误导、愚民，颇类现代汉语所说的“谣言”。这些谣言或谣言类言论，或散见于史籍纪、传，或与朝野间流行的诗讖、民谣一起，由传统历史编纂者编入《五行志》诗妖类，成为诠释历史时的小小注脚。我们今天如果要研究古代历史上的谣言，历代的《五行志》可以说是一个宝库。”^④《五行志》中的天象必须与人事对应，所以后世史官常常以时人的先见之明诠释历史，穿凿附会，无中生有。

其实汉魏之际有“狼顾相”的不仅仅是司马懿，连后世被誉为忠臣之圭臬的诸葛亮亦被蜀安汉将军李邕指斥有“狼顾虎视”。李邕曾上书后主刘禅曰：“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诸葛）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⑤然而李邕所言被事实证明乃是子虚乌有，故《五行志》就不会有相应的记载。反之，若诸葛亮一旦“自取”^⑥，登上九五大位，则《五行志》亦必然录上与“狼顾虎视”相关的种种征兆。

司马懿何时萌生代魏之心，一般都将时间节点定在他发动高平陵之变的正始十年（249），因为司马懿通过高平陵之变，全面掌控了曹魏的中枢机构，开启了亡魏成晋的历史进程。然而司马懿在淡出权力中枢10年之后，何以冒夷族灭门之险，突然发动此次政变，宋人叶适仍然茫然不解：“嘉平之役，极是异事。曹氏造基立业，虽无两汉本根之固，然自操至此已五六十年，民志久定；司马懿再世受遗，信非忠贞，何遽盗夺！而况虚位无权，势同单席，一旦因人主在外，闭门截桥，劫取事柄，与反何殊？此至患者不敢为，懿号有智，而披猖妄作，自取族灭，然竟以胜，一异也。”^⑦学界对高平陵政变颇为垂注，发明甚多，故笔者不再赘述。我之所以引用叶氏的这段论述，是借此说明，高平陵之变亦并非是历史的必然，其仍有一定的偶然性。换言之，即使在正始十年，司马懿已是曹魏位高权重的四世老臣，其是否萌发夺权代魏之意，尚有不确定的因素，何况其刚步入曹操幕府之时，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文学掾。曹操怎能穿越时空，早在数十年前就能察觉司马懿“有雄豪志”“狼顾相”，并梦三马同槽，还煞有介事地叮咛曹丕：“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既然“狼顾相”与

① 《晋书》卷29《五行志下》。

② 《晋书》卷28《五行志中》；《晋书·五行志》中司马代魏感应迹象的时间节点是在魏明帝太和、青龙年间，疑为好事者附会而成。

③ 《三国志》卷4《高贵乡公纪》。

④ 吕宗力《汉代的谣言》，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页。

⑤ 《华阳国志》卷10中《先贤士女总赞·广汉士女》，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766页。

⑥ 《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载“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⑦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29《魏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77页。

三马同槽纯属子虚，哪为何其事会在历史上广为流传，几乎成了妇孺皆知之事呢？我以为这与汉代颇为盛行的阴阳五行、讖纬神学以及受其影响的史书有极大关联。

汉武帝之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的阴阳五行说成为官方哲学后，它笼罩、统治汉代数百年，弥漫在几乎全部意识形态领域。东汉以降，阴阳五行及讖纬学更为盛行，卜筮、讖语、谣言、讹言、流言、相术充斥朝野，在民间广为流布。而且讖谣、异象、异梦、骨相在所谓的“受命之君”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史记·高祖本纪》开篇就叙述刘邦母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龙）遇而感生。刘邦骨相“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刘邦丰西泽中醉斩大蛇，时人传说为赤帝子斩白帝子。秦汉之际，“东南有天子气”，秦始皇“于是因东游以厌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碭山泽岩石之间”，吕氏却能找到刘邦，是因“季所居上常有云气”^①。对这类赋予开国之君的政治神话，后世不少学者持怀疑态度，认为或属刻意伪造，或属神化。^②为何史学巨著《史记》会将此类“荒诞无稽”的神话、讖言采入《高祖本纪》呢？一种解释是司马迁“好怪”，“不能裁之以义”^③。另一种解释是这些神话并非是司马迁原文，疑为后人伪窜。^④

笔者无意对《史记·高祖本纪》中的这类神话再作考订，只是觉得连“史界太祖”^⑤司马迁抑或不免将此类“荒诞不经”之说引之于史，以后的史家又怎能幸免呢！治魏晋史者悉知，唐初修撰的《晋书》只用臧荣绪《晋书》作蓝本，并兼采笔记小说的记载，稍加增饰。对于其他各家的晋史和有关史料，虽然也曾参考过，却没有充分利用和认真加以选择辨析。因此成书之后，即受到当代人的指责，认为它“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由是颇为学者所讥”^⑥。刘知几对《晋书》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它不重视史料的甄别取舍，多语怪力乱神，^⑦损害了作为正史的权威性。“其所采择，忽正典而取小说”是诸多学者对于《晋书》最主要的批评。^⑧而《晋书·宣帝纪》中的“狼顾相”与“三马同食一槽”不正是小说家言吗！故后来就为罗贯中写入小说《三国演义》之中。^⑨

三

司马懿的“狼顾相”及“三马同食一槽”的讖谣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⑩这是本文探究考辨的

① 《史记》卷8《高祖本纪》。

② 邵泰衢《史记疑问·高祖纪》云：“白帝赤帝之讹，盖如白鱼赤乌之伪而已。”转引自杨燕起等编《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58页。《续古今考》言斩蛇事是伪为神奇，史公好奇载之，参见梁玉绳《史记志疑》卷6，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15页。

③ 徐经《雅歌堂文集》卷4《书高帝本纪》，转引自杨燕起等编《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58页。

④ 顾颉刚指出：“司马迁时不能有此事，必出伪窜。”参见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载《古史辨》第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92页；吕思勉亦持此说：“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疑为后人增窜，非谈、迁原文也。”参见吕思勉《秦汉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817页。

⑤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7页。

⑥ 《旧唐书》卷66《房玄龄传》。

⑦ 刘知几《史通通议》云：“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诙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取说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参见刘知几《史通通议》卷5《采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16-117页。

⑧ 李慈铭《越缙堂读书记》，上海：上海书店，2000年，第257-258页；吕思勉《论晋书七》，载《吕思勉读书札记（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017-1019页；李培栋《晋书研究》，载《魏晋南北朝史缘》，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108-139页。

⑨ 罗贯中《三国演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第626-627页。

⑩ 案：作为西晋王朝奠基者的司马懿头上不仅无刘邦的“隆准而龙颜”“赤帝子斩白帝子”“东南有天子气”等种种神话的光环笼罩，反而被时人诟病为具有“狼顾相”，并杜撰出“三马同槽”的讹言，其因何在？这是须要考订的重要问题。

核心问题。仇鹿鸣认为“分析历史记载的形成过程，探究历史书写背后的目的与时代背景，努力突破文本叙事所可能带来的遮蔽，趋近历史的实相，已成为许多史家自觉努力的目标”^①。仇氏的上述观点以及陈寅恪对史料的发覆之功对于笔者颇有启发。我以为“狼顾相”与“三马同槽”记载的形成过程与背后的时代背景正表明了魏晋时期人们对司马代魏的普遍看法。

高平陵之变后，“夏侯霸降蜀，姜维问之曰：‘司马懿既得彼政，当复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营立家门，未遑外事。’”^②所谓“营立家门”，周一良诠释云：“并非谋求发家致富，而是谋求取代曹氏政权，篡夺政权，司马氏之心固不待司马昭而路人皆知矣。”^③可见，司马懿在高平陵政变中施展的阴谋权术与狠毒凶残已暴露无遗，其政治品格不断地受到时人的谴责。由于史家对高平陵政变之事，早已烂熟于胸，故笔者对事件过程不展开叙述，而只讨论时人的看法。^④

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因曹爽放弃抵抗而很快获得全胜。接下来，如何处置曹爽等人便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司马懿以黄门张当为突破口，炮制出所谓曹爽“阴谋反逆”的大罪，于是诛杀曹爽兄弟，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张当等，皆夷灭三族。^⑤按照“成王败寇”的历史法则，司马懿惩治曹爽一党，本不足奇，问题在于，当初司马懿对曹爽承诺只要放弃兵权，即“免官而已”，而且又是由殿中校尉尹大目、侍中许允、尚书陈泰、太尉蒋济等人作担保，以洛水为誓，^⑥不可谓不郑重，故曹爽才打消了疑虑，讲出“我不失作富家翁”^⑦之语，而俯首臣服。可见司马懿的旦旦誓言才是瓦解曹爽意志并迅速剪除曹爽集团的关键之举。司马懿在此事件中的出尔反尔、言而无信造成了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蒋济、许允、尹大目、陈泰等人，或表示了极度的愤懑，或日后成为司马氏的政敌。当曹爽被杀，司马氏党羽纷纷论功行赏之际，蒋济却拒绝晋爵增封，因为他从司马懿大肆杀戮曹魏皇室宗子枝属的行动中，察觉出司马懿篡政夺权之心。蒋济感到自己失信于曹爽，故极为羞愧，不久负疚而病歿。^⑧许允在嘉平六年（254）与夏侯玄、李丰等人共同策划诛灭司马师兄弟，最后事败，被司马师流徙乐浪郡，于半道而死。^⑨司马懿利用曹爽的心腹尹大目来诱骗曹爽，尹大目眼见曹爽因自己而死，悔恨交加，故后来助毋丘俭反司马师。^⑩陈群、陈泰父子与司马氏为世交，泰父陈群与司马懿、吴质、朱铄同为曹丕四友，陈泰更是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的至交，两家有通家之谊。然而面对高贵乡公曹髦被司马昭所弑，陈泰悲痛欲绝，“帝之崩也，太傅司马孚、尚书右仆射陈泰枕帝尸于股，号哭尽哀”，陈泰怒不可遏地对司马昭说：“独有斩贾充，少可于谢天下。”司马昭不

① 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0页。

② 《三国志》卷28《钟会传》注引《汉晋春秋》。

③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曹氏司马氏斗争”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7页。

④ 案：高平陵之变后时人的看法，无疑可作为司马篡魏观念的滥觞与形成。

⑤ 《晋书》卷1《宣帝纪》载“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三国志》卷28《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载“同日斩戮，名士减半。”

⑥ 《三国志》卷9《曹爽传》注引《世语》载“宣王使许允、陈泰解语爽，蒋济亦与书达宣王之旨，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谓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为誓。爽信之，罢兵。”

⑦ 《三国志》卷9《曹爽传》注引《魏氏春秋》。

⑧ 《三国志》卷9《曹爽传》注引干宝《晋纪》载“蒋济以曹真之助力，不宜绝祀……济又病其言之失信于爽，发病卒。”《三国志》卷14《蒋济传》注引《世语》曰“初，（蒋）济随司马宣王屯洛水浮桥，济书于曹爽，言宣王旨‘惟免官而已’，爽遂诛灭。济病其言之失信，发病卒。”

⑨ 《三国志》卷4《齐王芳纪》注引《世语》及《魏氏春秋》并云“此秋，姜维寇陇右。时安东将军司马文王镇许昌，征还击维，至京师，帝于平乐观以临军过。中领军许允与左右小臣谋，因文王辞，杀之，勒其众以退大将军。”《三国志》卷9《夏侯玄传》注引《魏略》曰：“（许）允闻李丰等被收，欲往见大将军，已出门，回遑不定，中道还取袴，丰等已收讫。大将军闻允前遽，怪之曰：‘我自收丰等，不知士大夫何为忽怨乎？’是时朝臣遽者多耳，而众人咸以为意在允也……允以嘉平六年秋徙，妻子不得自随，行道未到，以其年冬死。”

⑩ 《三国志》卷28《毋丘俭传》注引《魏末传》载“殿中人姓尹，字大目，小为曹氏家奴，常侍在帝侧，大将军（司马师）将俱行。大目知大将军一目已突出，启云‘文钦本是明公腹心，但为人所误耳，又天子乡里。大目昔为文钦所信，乞得追解语之，令还与公复好。’大将军听遣大目单身往，乘大马，被铠甲，追文钦，遥相与语。大目心实欲曹氏安，谬言‘君侯何苦若不可复忍数日中也！’欲使钦解其旨。钦殊不悟，乃更厉声骂大目……大目涕泣曰‘世事败矣，善自努力也。’”

允，要他“更思他言”，陈泰坚决不同意，说“岂可使泰复发后言”。^①不久，陈泰呕血而死。值得注意的是不仅陈泰、蒋济、许允等司马氏的故旧心腹对司马父子的狡诈凶残有了清醒认识，连司马懿之弟太傅司马孚也觉得司马昭弑君有悖君臣之道，故“枕尸于股，哭之恸，曰：‘杀陛下者臣之罪’，奏推主者”。临终前他一再声称自己是“大魏之纯臣”“有魏贞士”，^②对司马昭弑君，司马炎受禅表示了不满。高平陵之变本是曹魏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但司马懿过于阴鸷残暴的行径使蜀人也为曹爽的遭遇而鸣不平。蜀汉大将军费祎认为：“爽无大恶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废之刑之可也。灭其尺口，被以不义，绝子丹血食，及何晏子魏之亲甥，亦与同戮，为僭滥不当矣。”^③这是局外人的看法，当属公允之论。

在中国历史上，以禅代模式成功地进行易代更祚的始作俑者是曹操、曹丕父子，^④司马氏只不过因袭曹魏故事，如法炮制而已。然而在汉晋之际人们的观念中，与曹氏相比，对司马氏的品评似乎更等而下之。曹操虽被吴、蜀等敌国骂为“汉贼”，然而《三国志·太祖本纪》却对其高度评价，并无不恭之词；反之《晋书·宣帝本纪》对司马懿的评价中竟然出现“三马同食一槽”“狼顾相”“猜忍”等严重的贬义词。更令人吃惊的是《宣帝纪》的篇末记载了东晋宰辅王导与明帝的一段对话：

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司马懿）创业之始，及文帝（司马昭）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

王导向明帝讲述的司马懿“创业之始”，即指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诛杀曹爽；“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是指司马昭弑魏主曹髦。而身为司马氏后裔的晋明帝竟然认为祖宗以如此手段夺权，颇不光彩，故羞愧地说：“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可见，司马篡魏的理念在魏晋人的心目中业已根深蒂固。古人对儒家纲常伦理、君臣名分的看重本不足为奇，问题是汉晋时期的人们为何对司马代魏颇多诟病、更有成见？这里不妨引用清代史学家赵翼的观点加以说明：

操当汉室大坏之后，起义兵，诛暴乱，汉之臣如袁绍、吕布、刘表、陶谦等能与操为敌者，多手自削平，或死或诛。其在朝者，不过如杨彪、孔融等数文臣，亦废且杀。其余列侯将帅，皆操所擢用……司马氏则当文帝、明帝国势方隆之日，猝遇幼主嗣位，得窃威权。其时中外臣工尚皆魏帝所用之人。内有张缉、苏铄、乐敦、刘贤等，伺隙相图；外有王凌、毋丘俭、诸葛诞等相继起兵，声讨司马氏。惟恃挟天子以肆其奸，一离京辇，则祸不可测。故父子三人执国柄，终不敢出国门一步，亦时势使然也。然操起兵于汉祚垂绝之后，力征经营，延汉祚者二十余年，然后代之。司马氏当魏室未衰，乘机窃权，废一帝、弑一帝而夺其位，比之于操，其功罪不可同日语矣。^⑤

赵翼的看法讲出了曹氏代汉、司马代魏的不同背景和条件，曹氏先有护佑汉献帝、续延汉祚20余年之大功，而后诛灭暴乱，削平诸侯，恃仗功业而代汉称帝。司马氏对曹魏王朝并无多大功劳可言，仅仅凭借暴力和权术，废弑魏主而登大位。赵翼的这个分析至少代表了魏晋至清代大多数人的看法，包括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也持如是之见解。^⑥

有晋以降的不少帝王与史家都认为司马氏弑主篡逆，得天下不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唐太宗

① 《三国志》卷22《陈泰传》注引《魏氏春秋》。

② 《晋书》卷37《安平献王孚传》。

③ 《三国志》卷44《费祎传》注引《殷基通语》。

④ 朱子彦《汉魏禅代与三国政治》第1章《王朝鼎革的主流形态：以汉魏禅代为中心》，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第14-73页。

⑤ 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卷7“魏晋禅代不同”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47-148页。

⑥ 《读通鉴论》卷10载：“曹操之篡也，迎天子于危亡之中而措之安土；二袁、吕布、刘表、刘焉群起以思移汉祚，献帝弗能制，而操以力胜而得之……由此言之，虽篡有天下，而岂易易哉？司马懿之于魏，掾佐而已，拒诸葛于秦川，仅以不败，未尝有尺寸之功于天下也；受魏主睿登床之托，横翦曹爽，遂制虜君、胁群臣，猎相国九锡之命，终使其子孙继世而登天位，成一统之业。”参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35页。

为《晋书·宣帝纪》所撰的制书，他对司马懿的欺伪之行作了严厉的批评：“（司马懿）受遗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托，曾无殉生之报。天子在外，内起甲兵，陵土未干，遽相诛戮，贞臣之体，宁若此乎……辅佐之心，何前忠而后乱？故晋明掩面，耻欺伪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业。古人有云：‘积善三年，知之者少，为恶一日，闻于天下。’可不谓然乎！虽自隐过当年，而终见嗤后代。亦犹窃钟掩耳，以众人为不闻，锐意盗金，谓市中为莫覩。故知贪于近者则遗远，溺于利者则伤名，若不损己以益人，则当祸人而福己。”由此可知，《晋书》对司马篡魏的看法，不仅是魏晋人的观点，也是唐人的观点。李世民是一位非常注重资鉴历史功能的皇帝，他在《修晋书诏》中明确指出历史的使命是经世致用：“盖史籍之为用也……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①可见，李世民对司马懿之评有警世之意。降及后世，如王夫之、赵翼等人的评判都极具代表性，至此司马篡魏几乎成了层累的历史结论。^②

辨析司马篡魏观念滥觞与形成的历程，再将狼顾相、三马同槽同传言、讖谣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就容易得多，其种种疑团也就不难迎刃而解。检索史书，我们发现汉晋之际的诸多童谣、民谣、传言、神仙说，与权臣、帝王命运及天下大势皆紧密关联，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朝野与士庶民众的看法。在此不妨举汉晋之际在民间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数例讖谣：

献帝践祚之初，京都童谣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案千里草为董，十日卜为卓。^③

仙人李意其，蜀人也。传世见之，云是汉文帝时人。先主欲伐吴，遣人迎意其，意其到，先主礼敬之，问以吉凶。意其不答而求纸笔，画作兵马器仗数十纸已，便一一以手裂坏之，又画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便径去。先主大不喜。而自出军征吴，大败还，忿耻发病死，众人乃知其意。其画作大人而埋之者，即是言先主死意。^④

（黄初）七年春正月，将幸许昌，许昌城南门无故自崩，（魏文）帝心恶之，遂不入……丁巳，帝崩于嘉福殿。^⑤

兴平中，吴中童谣曰“黄金车，班兰耳，闾昌门，出天子。”^⑥

有星赤而芒角，自东北西南流，投于亮营，三投再还，往大还小，俄而（诸葛）亮卒。^⑦

魏咸熙元年六月，镇西将军卫瓘至于成都，得璧玉印各一枚，文似“成信”字，魏人宣示百官，藏于相国府。（向）充闻之曰“吾闻谯周之言，先帝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今中抚军名炎，而汉年极于炎兴，瑞出成都，而藏之于相国府，此殆天意也。”是岁，拜充为梓潼太守，明年十二月而晋武帝即尊位，炎兴于是乎征焉。^⑧

孙休永安二年，将守质子群聚嬉戏，有异小儿忽来言曰“三公锄，司马如。”又曰“我非人，荧惑星也。”言毕上升，仰视若曳一匹练，有顷没。^⑨

①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81《修晋书诏》，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67页。

② 必须指出，近现以降，学界对司马代魏的看法已与古人不完全一致，甚至大异其趣。本文只是探讨司马篡魏的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并不代表笔者也认同此观念，我认为，今日学者对司马代魏可以见仁见智，作出更客观、更符合历史的评判。

③ 《后汉书》志13《五行志一》。

④ 《三国志》卷32《先主传》注引葛洪《神仙传》。

⑤ 《三国志》卷2《文帝纪》。

⑥ 《三国志》卷47《吴主传》。

⑦ 《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注引《晋阳秋》。

⑧ 《三国志》卷41《向朗传附向充传》注引《襄阳记》。案：向充所说的“先帝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之讖，并非是谯周所造，而是谯周受之于杜琼。蜀汉景耀五年（262），谯周见蜀宫中大树无故自折，以为不祥，遂依杜琼所言而推曰“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陈寿解释道“言曹者众也，魏者大也，众而大，天下其当会也。具而授，如何复有立者乎？”参见《三国志》卷42《杜琼传》。

⑨ 《晋书》卷28《五行志中》。

天玺元年，吴郡言临平湖自汉末草秽壅塞，今更开通。长老相传，此湖塞，天下乱，此湖开，天下平。^①

从上述记载中可知，汉晋之际凡重要人物死亡及王朝兴废都有星变或谣讖的出现，而狼顾相、三马同槽即预示司马氏最终将取代曹魏，和上述童谣、讖语的兆示毫无二致。然而给读史者设置的层层迷雾是“狼顾相”与“三马同槽”记载于《晋书·宣帝纪》中，而非出自《五行志》《搜神记》《神仙传》及稗官野乘内，否则一眼就能识破这是讖纬神学，何用后世学者发微抉隐，恢复本相。当然，这里还有个问题，即狼顾相与三马同槽为何会出自曹操之口？我以为作为官修的《晋书》最终完成于唐代，故《晋书》亦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唐人的观念。曹操形象的贬损是在宋代以降，唐人对曹操的文韬武略、卓著功勋还是十分敬佩的。如唐太宗就对曹操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帝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于往代。”^②并认为魏武帝“若无多疑猜人之性，几为完人也。”^③《晋书》的编纂深受唐初意识形态的影响，特别是《晋书·宣帝纪》的“制曰”是太宗御撰，故不排除史官在《晋书·宣帝纪》中美化、神化曹操的可能，就是杜撰曹操慧眼识人，早就洞察到司马懿“有狼顾相”。

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司马懿的狼顾相以及三马同食一槽的讖谣为何在历史上流布如此之广，以至于后来成为妇孺皆知的史实。对此问题吕宗力作了侧面、但很精辟的解读：“谣言（包括以民谣、童谣形式出现的谣言）应该是无处不在的。编入两汉《五行志》的童谣，应该是经过选择、编辑之后剩下来的很小一部分。史家之所以选择这些童谣，一是因为它们与重大历史事件或人物的关联性，二是它们‘预言’的‘灵验性’。未曾应验的童谣，只是讹言、妖言，不能算讖谣。”^④笔者按吕氏观点演绎推理，司马懿的“狼顾相”以及“三马同食一槽”即是应验了的讖谣，^⑤只不过是史家为了使此讖谣更具威权性，故将其移花接木到曹操身上。曹操与司马懿是魏晋时期的重量级人物，也是魏晋王朝的肇基之君，故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讖谣也就不胫而走，传之后世了。同样是开基之主的政治神话，或许司马懿的“狼顾相”与“三马同槽”远不如刘邦的“隆准而龙颜”“赤帝子斩白帝子”来得那么正统、权威和具有说服力，但可能也是另一种皇权神授的表现形式。两晋时期所撰的诸家旧晋书的作者也有假借史书编纂为新朝寻求政治合法性的可能，他们灵活地运用“狼顾”说的特异相貌，以证明晋朝的君权神授，这也不失为另一种政治神话的论证手段。当然，其是否能达到所预期的效果，只能由历史来判断、鉴定了。

责任编辑：尚永琪

① 《三国志》卷48《孙皓传》。

② 董诰等《全唐文》卷10《太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13页。

③ 转引自宋战利《魏文帝曹丕传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7页。

④ 吕宗力《汉代的谣言》，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3页。案：汉魏时期，民间流传的讹言、妖言不少，但有的并未应验。如《三国志》卷48《孙皓传》注引《江表传》曰：“初，丹杨刁玄使蜀，得司马徽与刘虞论运命历数事。玄诈增其文以诳国人曰：‘黄旗紫盖见于东南，终有天下者，荆、扬之君乎！’又得中国降人，言寿春下有童谣曰‘吴天子当上’。皓闻之，喜曰：‘此天命也。’即载其母妻子及后宫数千人，从牛渚陆道西上，云青盖入洛阳，以顺天命，行遇大雪，道途陷坏，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车，寒冻殆死。兵人不堪，皆曰：‘若遇敌便当倒戈耳。’皓闻之，乃还。”

⑤ 《三国志》卷8《公孙瓒传》注引裴松之曰：“童谣之言，无不皆验。”